

论隋炀帝诗文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

郑国周^{1,2}

(1.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8; 2.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隋炀帝是一位虔诚而理性的佛教徒,他受佛教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其诗文中有明显的表现。在全面统计隋炀帝现存与佛教有关诗文的基础上,细检其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可以发现,随炀帝三教并重但在宗教情怀上更倾向于佛家。他受菩萨戒,延请高僧大德,资助扩建寺院帮助搜集佛经,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与此同时,南北朝以来玄佛合流的审美倾向在其诗文中亦有所体现。

关键词:隋炀帝; 诗文; 佛教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2)08-105-112

钱钟书《管锥编》曰:“佞佛帝王之富文采者,梁武、隋炀、南唐后主鼎足而三,胥亡国之君。史论每咎梁武、李后主之佞佛,却未尝以此责隋炀。当缘梁武、李后主佞佛,害于其政,著于其寻常行事,而隋炀佞佛,不若是之甚。唐人小说《隋遗录》、《迷楼记》、《海山记》等只字不道其佞佛逸事,有如梁武帝之散头发僧践踏、李后主之削屎楸供僧抽解也。”^{[1]2399}其实隋炀帝是一位虔诚而理性的佛教徒,他受佛教的影响当较为深刻,而这种影响在其诗文中有明显的表现。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尚未有从佛教文化角度系统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文学创

作的论著。在此,细检隋炀帝现存诗文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在感受其宗教信仰与佛家情缘的同时,从另一侧面理解与把握隋炀帝所受佛教影响的具体情形,以期从更深层面更广视角认识观照隋炀帝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特点。

一、隋炀帝现存与佛教有关的诗文比例

据《隋书·经籍志》,隋炀帝曾有集 55 卷,现存诗文亦相对较多,计诗歌 47 首,赋、文共约 137 篇,其中不少与佛教存在关联。现统计如下:

隋炀帝现存诗文各文体与佛教关联的比例表

| 文体 | 诗歌 | 赋 | 铭 | 诔 | 檄 | 书 | 叙 | 诏 | 教 | 制 | 令 | 教 | 其它 |
|-------|------|---|------|----|----|-----|----|----|-----|----|------|------|-----|
| 现存总数 | 47 | 2 | 1 | 1 | 2 | 47 | 1 | 55 | 12 | 7 | 1 | 1 | 7 |
| 存目篇数 | 0 | 2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 与佛教有关 | 3 | | 1 | 0 | 0 | 42 | 0 | 0 | 6 | 0 | 1 | 1 | 6 |
| 所占比例 | 6.4% | | 100% | 0% | 0% | 89% | 0% | 0% | 50% | 0% | 100% | 100% | 86% |

基金项目:2011 年贵州大学青年项目“隋代弘农杨氏及其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郑国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本表参考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骆玉明、陈尚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韩理洲《全隋文补遗》等，并略有考辨所得。其中，书包括玺书 2 篇、赐书 1 篇、令书 2 篇、手书 1 篇、书信 41 篇等；其它一类分别是受戒疏 1 篇、愿文 3 篇、答文 1 篇、祭文 1 篇、上言 1 篇等，上言为隋炀帝作太子时所上奏疏。另，赋 2 篇皆佚，仅存目，无法判断，故不予统计比例；诏有 1 篇存目，为《即位改元大赦诏》，此诏当与佛教无关，且其余 54 篇亦皆与佛教无关，几乎不影响数据分析，故权且忽略。

基于隋炀帝现存诗文统计，自然未必能真实、准确反映其诗文创作情况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但基于与佛教关联诗文较多的事实，依然可以得出隋炀帝受佛教影响较大的结论。钱钟书《管锥编》曰：“炀帝《与释智顓书》三十五首。按同卷尚有《与天台山众令书》、《与东林寺僧书》等八首，卷五有《敕答释智越》、《敕度一千人出家》等五首，卷六《受菩萨戒疏》、《祭告智顓文》等通卷六首都为释氏作。前此帝王惟梁武为释氏作文最多，而见存不足三十首，特有浩汗巨篇，隋炀则无是也。”^{[1]2398}亦指出炀帝佛文较多的现象。就炀帝现存与佛教有关的诗文，具体有以下几点值得说明与探讨：

1. 隋炀帝现存诗、文共约 184 篇，其中除 2 篇赋和 1 篇诏无法判断外，计 60 篇确定与佛教有关，约占 33%，即约三分之一的诗、文与佛教关联。其中诗歌共 47 首，其中 3 首明显与佛教有关，占 6.4%；赋、文共约 137 篇，至少 57 篇与佛教有关联，占 41.6%。当然这个比例不能过分解读。如其令、教各只存 1 篇，皆与佛教有关，显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散佚的应该多与佛家无关。如还原真实，隋炀帝文集全部作品不可能近三分之一的作品与佛教有关。但 60 篇之数，即便放在隋炀帝 55 卷的全部创作之中，这也是不能被忽视的。作为帝王兼作家，在其诏、制等并没有涉及佛教的情况下，隋炀帝依然有 60 篇与佛相关的作品，这在整个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为何与佛教关联的作品留存较多呢？这与佛家的重视有关。现存与佛教有关的作品除个别篇目外，几乎全部出自《广弘明集》《续高僧传》《国清百录》等佛教典籍中。换言之，在隋炀帝文集散佚后，这些作品全赖相关佛典

得以保留。这是因为隋炀帝对佛教作用巨大，影响不小，佛家十分重视甚至珍视这段因缘，所以载录了其与佛家相关的作品。但其书信多保留于专收天台宗文献的《国清百录》，因此，隋炀帝给其他高僧大德的信件未必已为佛家尽录。钱钟书《管锥编》曰：“国清寺自隋文帝为智顓勅建以还，香火绵延，故台宗文献足征，隋炀为释氏而作之笈启誓告等篇，流遗遂多。”^{[2]2399}即持同样观点。

2. 隋炀帝现存诗歌共 3 首明显与佛教有关，占 6.4%。需要说明的是，隋炀帝另有三首诗歌在意趣与意象上应该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痕迹并不明晰，故未予统计，详论见下。考虑到佛家的重视与佛典的载录这一事实，相信若有其它诗歌与佛教关联，这些佛典不会不记。因此，隋炀帝诗歌可能与佛教关联不算多。从隋炀帝诗歌情志看，他更多关注今生与现实，常有宏图霸业之志，与佛家情怀不类。换言之，隋炀帝不是纯粹的佛徒，其佛家情怀并不占据其最重要的位置。同时，这或许与隋代诗歌发展的现实亦有关联。南北朝之际，南朝诗歌受佛教影响更多，谢灵运、梁武帝、江总等是其代表。入隋后，南北诗风继续融合，但像江总等受佛教影响较大的诗人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创作明显减弱，影响减小；与隋炀帝唱和的其它诗人佛教情缘亦颇有限，与佛教有关的诗歌创作不多。因此，在隋代诗坛，佛文化氛围似乎尚嫌不足。

3. 隋炀帝作为帝王的诏书中并无与佛有关的内容。一般帝王诏令较多，涉及事类较广。隋文帝有《五岳各置僧寺诏》《检括破故佛像诏》《禁毁盗佛道神像诏》《立舍利塔诏》《再立舍利塔诏》《诏延释县迁》《诏释智舜》《诏释灵裕》等诏，也有《手敕释灵藏》《敕佛寺行道日断杀》《敕复佛像》《敕释县迁为禅定寺主》等敕。而隋炀帝则无与佛教相关的诏书，只有《敕禁僧风抗礼》《敕度一千人出家》《敕释智越》等 6 道敕书。从内容看，与隋炀帝的部分内容相似的隋文帝亦用诏书的形式。隋文帝崇佛甚至佞佛，而隋炀帝相对理性。因此，未知这种现象是否只是两位皇帝的习惯不同，或诏令制度有微小变化，还是反映了两者的态度确实对待佛教的态度有所不同。

二、隋炀帝诗歌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

隋炀帝现存诗歌中有3首明显与佛教有关,分别是《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谒方山灵岩寺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现逐一分析。先论《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诗曰:

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飒洒林花落,逶迤风柳散。孤鹤逝追群,啼莺远相唤。莲舟水处尽,画轮途始半。江沪各自遥,东西并兴叹。已熏禅慧力,复籍金丹扞。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诗见《广弘明集》卷三十。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分别为隋炀帝所置四大道场之一。晋王杨广镇扬州时,佛、道并重,修建四大道场,佛、道各二,供其弘法传道。《续高僧传·释吉藏传》亦曰:“开皇末岁,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又,《续高僧传》卷十五之论曰:“自爱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集古今佛道论衡》曰:“(炀帝)昔居晋府,盛集英髦。慧日、法云,道场兴号。玉清、金洞,玄坛著名。四海搜扬,总归晋邸。”等,都明确提到这四大道场。

诗人该诗兼示僧、道,同标玄、佛,颇有特点。一方面,隋炀帝作为政治家,佛、道并重,平衡各派,这是他的基本方略;另一方面,就诗歌本身而言,炀帝做到了兼美玄、佛,脱俗超然,显然是受到了玄佛合流思潮的影响。自东晋以来,江左玄佛已呈合流之势,并在诗歌中得以表现。如谢灵运、江总等人很多诗歌即是如此。因此,隋炀帝兼及佛、道,也可以说是学习江总的一种具体表现。在诗中,诗人通过对佛、道所在之景物描绘,创造了一种萧散高远、清寂洗练的意境,体现出一种脱俗与超然。随后诗人结合佛、道而点题:“已熏禅慧力,复籍金丹捍。”其“禅慧”自然意指佛家,而“金丹”乃指道教,意即唯有在佛、道的指引与帮助下,才可能体悟这种“妙道”,达到这种脱俗而超然之境。不仅如此,诗人还将佛、道与儒家比较以凸显之。所谓“有异三川游”,应指与红尘世俗之境不同;所谓“四门”,当指四门小学,《北史·儒林传序》

曰:“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后置四门博士。这里代指儒学,故所谓“曾非四门观”,乃指与现世儒家的体悟有别。显然,隋炀帝有讨好佛、道之意,但也符合诗教潮流与审美趋向。

次论《谒方山灵岩寺诗》。诗曰: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迴旛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

诗见《广弘明集》卷三十。方山即灵岩山,位于泰山西北麓,是泰山十二支脉之一。方山灵岩寺,始建于东晋,唐后与国清寺、栖霞寺、玉泉寺并称“海内四大名刹”,位列其首。诸葛颖有和诗《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题称应教,可知作于隋炀帝为太子以前。《续高僧传·释道辩》曰:“释道辩,齐人,住泰山灵岩寺,居无常所,游行行为任,经史洞达,偏解算术。以大业年中来游襄部,年过七十。”知隋炀帝作此诗时道辩应仍住泰山灵岩寺。

隋炀帝诗中用“梵宫”、“疏钟”、“禅枝地”、“菩提心”等佛家意象及用语,高标主题,佛意甚浓。再用“灵岫”、“迴旛”等增其效果。同时,像“高峰落远阴”、“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等诗句,写景清疏而空灵,颇近禅意。全诗文辞洗练,意境高妙,可以视为是一首较早的难得的禅诗。

诸葛颖有《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曰:“名山镇江海,梵宇驾风烟。画拱临松盖,凿牖对峰莲。雷出阶基下,云归梁栋前。灵光辨昼夜,轻衣数劫年。一陪香作食,长用福为田。”相较而言,颖诗虽也极力套用佛语,突出佛意,但无论意境之优美圆融,还是佛语的精炼自然,都远不及隋炀帝之诗。

再论《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诗曰: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华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诗见《广弘明集》卷三十。周隋之世,每逢正月十五,百姓大戏,张灯结彩,热闹异常。《隋书·音乐志》曰:“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優、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

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隋文帝从俭治国,反对百戏,曾下令禁止,但民间却似乎禁而不绝。《隋书·长孙平传》曰:“(长孙平)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釜甲之象,上怒而免之。”长孙在州时间大约在开皇中期。可知这时民间正月十五依然如故。薛道衡有《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同样记正月十五日的情形,且更为详细精彩,如“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欢笑无穷已,歌咏还相续。”“卧驱飞玉勒,立骑转银鞍。纵横既跃剑,挥霍复跳丸。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狡狴弄斑足,巨象垂长鼻。青羊跪复跳,白马回旋骑。”等,极为生动详细。惜许善心原诗已佚,少了一条研究此间民俗的重要文献材料。显然,周隋之世,正月十五日俨然成为了一个狂欢节。其中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一是灯火,二是百戏。无论《隋书·音乐志》《奏禁上元角抵戏》,还是《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都无一例外的指出了这两个特点。事实上,唐以后正月十五又称“灯节”,《燕京岁时记·灯节》曰:“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不过,这种灯火元素,在周隋世已然形成。隋炀帝诗题即为《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其诗及诸葛颖和诗皆盛赞烟火,即是明证。

但隋炀帝本诗与其它载记稍有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其关于佛家活动的记载。如前所引各条材料其实都未提及佛家。当然,佛家的参与是可能的,只是其它文献未有特别记载而已。而隋炀帝可能观看及记录的是正好佛家正月十五日的活动。因此,隋炀帝未记百戏,但突出描绘所见烟火,并用“法轮”、“梵声”、“幡”、“钟”等表现其佛教特色。诸葛颖《奉和通衢建灯应教》亦是如此。其诗曰:“芳衢澄夜景,法炬烂参差。逐轮时徙焰,桃花生落枝。飞烟绕定室,浮光映瑶池。重阁登临罢,歌管乘空移。”颖诗亦用“法炬”、“逐轮”等表现佛意。又,隋炀帝题称“升南楼”,诸葛颖诗写“重阁登临罢”,未知是即事名篇,缘事而发,还是与当时登高之俗有关。魏晋后,正月十五日渐有登高之俗。宗懔《荆楚岁时记》曰:“《石虎邺中记》:‘正月

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则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隋书·元胄传》亦曰:“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看来登高在隋代依然存在。隋炀帝、诸葛颖之升楼观灯或亦合于此俗。

另,隋炀帝《月夜观星诗》有“团团素月净,悠悠夕景清。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的诗句,由泉、石、风、月、夜等意象组合而成的一幅清静而灵动的画境,颇有玄思和禅意。《北乡古松树诗》“云来聚云色,风度杂风音。”《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等,亦有这种特色。如前所述,这其实是玄、佛合流下的一种审美情趣,应视为禅诗发展的一个阶段。

可见,隋炀帝颇有佛缘,深谙佛理,对佛家的审美意趣亦感悟甚深,因此,其涉及佛家的诗歌,往往用语自然,意境清远,玄思仍在,而禅意渐浓,在其诗歌中颇为独特。

三、隋炀帝文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

根据以上统计,隋炀帝现存赋、文中,除赋 2 篇因文佚无法统计外,共至少 57 篇与佛教有直接关联,占全部现存赋、文的 41.6%,比例很大。其中书信 42 篇,占相关内容的 73.7%,即使在全部 60 篇与佛教相关作品中也占到 70%,可见隋炀帝与佛教相关的书信十分重要;而与智顓大师的书信 35 篇,又占全部书信的 83.3%。另外,像《受菩萨戒疏》《宝台经藏愿文》《遣使人天台为智顓建功德愿文》《天台设斋愿文》等就是其直接参与佛事活动的一部分。

(一)隋炀帝参与的佛事及其活动类型

隋炀帝一生与佛有缘,参与佛事极多,难予一一记录。现从其文可查者入手,将其重要之事类整理如下。

1. 接受菩萨戒

据《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续高僧传·释智顓传》《佛祖统纪·智者禅师纪》等可知,智顓大师于开皇十一年秋接到晋王杨广延揽之书,决定奉召。智顓大师到了江都后,随即为隋炀帝举行了菩萨戒的仪式。《受菩萨戒疏》即是在仪式时所作。其中曰:“谨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总管金城,设千僧蔬饭,敬屈禅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自此炀帝便正式皈依佛门,成为一名佛弟子。又,《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师云:‘大王纡遵圣禁,名曰总持。’王曰:‘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佛祖统纪·智者禅师纪》曰:“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大听事设千僧斋,授菩萨戒法。师谓王曰:‘大王纡遵圣禁,可名总持。’王赞师曰:‘大师传佛法灯,宜称智者。’”所记略同。

2. 召请高僧大德弘法

释法琳《辩正论》曰:“炀帝嗣膺宝历,兴建弥多。自昔在蕃邸,立四道场,释、老双标,内外资给。爰至登极,更广搜扬。一艺惠于有生,三征居于别馆。四事供养,二千余人。年别诸讳,普建大斋。各度僧尼,永充例程。大业末岁,妖寇勃生。虽郊垒多虞,干戈竞接,而隆敬尽一,终始无亏。”另据《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高僧传》《国清百录》等可知,智顛、灌顶、慧觉、慧则、吉藏、智果、智寿、法称、立身、善权、法琰、慧常、智凯等僧侣,皆应隋炀帝之召。其在隋炀帝现存文中,亦多有体现。智顛是隋炀帝最为倚重的高僧,其致书达35篇之多,往来之频,延请之诚,涉事之多,颇难细述。其他如《赐书召释慧觉》《下令延请释灌顶开讲法华》《下书释慧则》等,都是炀帝延请大师弘法书令。隋炀帝对这些延请弘法的大师都推崇备至,态度十分谦恭虔诚,表现了其足够的教养和德行。如《下令延请释灌顶开讲法华》曰:“夏序炎赫,道体休宜。禅悦资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需然。并《法华经疏》,随使人京也。伫迟来仪,书不尽意。”

3. 资助建寺扩院

作为普通佛徒,炀帝随时供奉施与,如隋炀帝《王遣使往匡山参书》曰:“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贡别牒,用忘存著,敢略繁辞。”同书又曰:“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右件其盐米悉出江州正仓,王灌赍合鱼开送。”智越亦有《谢皇太子施香炉铜钟等物启》《谢皇太子施胜幡法衣等物启》《谢敕施物启》等。再如《续高僧传·释智璨传》曰:“大业元年,驾幸江都。璨衔僧命,出参引见内殿。御遥见璨,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种种顾问。便遣通事舍人卢正方,送璨还山,为智者设一千僧斋,

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为寺造四周土墙。大业六年,又往扬州参见。仍遣给事侍郎许善心,送还山,又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覲斋僧人绢一匹。七年,又往涿郡参,劳谢远来。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执仗,防援还山。”等。

此外,隋炀帝对佛教最大最直接的贡献无疑是划拨田产、帮助其修建与扩大寺院规模。从炀帝文中可知其资助修建的寺宇有:慧日道场、法云道场、日严寺、弘善寺、国清寺、奉诚寺、龙光寺、光宅寺、鄞县阿育王塔寺等近十座寺宇。如国清寺是炀帝根据智顛大师的遗愿所建。其《答释智顛遗旨文》,曰:“遗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处,非常之好,垂为造寺,始得开剪林木,位置基阶。今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画。”该寺就是国清寺。又,《敕释智越》曰:“天台福地,实为胜境,所以敬为智者建立伽蓝,法缘既深,尊师义重,欲使宗匠遗范,奉而弗坠,菩萨净业,久而弥新。……既理由冥感,即号国清寺。”灌顶《〈国清百录〉序》曰:“到太隋开皇十八年其岁戊午,太尉晋王于山下,为先师创寺。因山为称,是曰天台。王登尊极,以大业元年龙集乙丑,敕江阳名僧云:‘昔为智者创寺,权因山称,今须立名。经论之内有何胜目,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诸僧表两名:一云禅门,一云五净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璨启国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敕取江都宫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遣兼内史通事舍人卢政力送安寺门。国清之称,从而为始。”可见隋炀帝为国清寺颇费心力,并多次下敕书指导。现存两敕,即《敕议天台山寺名》、《敕答释智璨允用国清寺名》。这自然体现了他对智顛大师的缅怀与感念。

又,释法琳《辩正论》曰:“隋炀帝(讳广)嗣膺下武,丞承大业。……乃聿兴净业,标树福田。大业元年,为文皇帝造西禅定寺。……又于高阳造隆圣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又舍九宫为九寺。于泰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知隋炀帝还建有西禅定寺、隆圣寺、清禅寺、香台寺等,另舍九宫为九寺,于泰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等等。然未见于隋炀帝之文。

4. 收集整理佛经

在隋炀帝扶持佛教发展的具体行为中,帮助整理佛家典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隋炀帝在平陈之初,见智顓之前,看到战乱而寺毁经亡,于是下令收集经卷,整理保存。其《宝台经藏愿文》曰:“至尊(笔者按:指隋文帝)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余燿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鬢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频属朝觐,著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则慧日法灵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小大,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分付。……”隋炀帝在战乱之际,还能特意安排人力收聚经卷,并整理交还,这对佛家而言,确为善举,贡献也非常直接,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当然,其后隋炀帝仍然重视整理佛经,可谓居功至伟。《隋书·经籍志》曰:“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释法琳《辩正论》亦曰:“隋炀帝(讳广)嗣膺下武,丞承大业。……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可见,隋炀帝自始至终都关注佛经整理抄补之事,而且数量巨大,对佛教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

5. 参与法事活动与僧侣交往

除受菩萨戒外,隋炀帝还参加了不少其它法事活动。如镇江都时将平陈期间收集经卷修复后,得“宝台四藏,将十万轴”,于是大兴法事,交付寺院,乃作《宝台经藏愿文》。又,智顓圆寂后,隋炀帝遣使入天台为智顓建功德,作《遣使入天台为智顓建功德愿文》;在天台设斋告祭,作《天台设斋愿文》、《祭告智顓文》等。据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所谓愿文,就是为法事时述施主愿意之表白

文。^{[4]2865} 隋炀帝现存愿文 3 篇,完整无缺。

与隋炀帝有往来的僧侣非常众多,但多数亦不可考。其文中所见主要有:智顓、灌顶、智越、智璨、照禅师、慧觉、慧则、法藏等。

天台宗创始人智顓大师是隋炀帝文中所见频率最高之僧侣,凡 49 篇,占全部与佛教有关诗文的 81.7%,如单计算与佛教有关之文,则比例更是高达近 86%。其中包括 35 篇与智顓的书信,另外还有《敕议天台山寺名》《敕答释智璨允用国清寺名》《敕释智越》《与天台山众令书》《下令延请灌顶开讲法华》《与东林寺僧书》《与禅阁寺僧书》《与峰顶寺僧书》《与达奚长儒书》《答释智顓遗旨文》《受菩萨戒疏》《遣使入天台为智顓建功德愿文》《天台设斋愿文》《祭告智顓文》等 14 篇与之有关。这表明智顓确实是隋炀帝交往的僧侣中的绝对核心。当然,这与隋炀帝对天台宗的作用及天台宗的载录也有很大的关联。

另,隋炀帝《与达奚长儒书》提及志果、法才、法璨、道慧、道臻等法师,《王重遣匡山参书》提及论法师、觉禅师等。又,隋炀帝有《与东林寺僧书》《与禅阁寺僧书》《与峰顶寺僧书》等书,知其与这些寺院僧侣也有往来,但未有名姓。此外,据《续高僧传》,吉藏、智果、智骞、法称、立身、善权、法琰、慧常、智凯等僧侣皆曾为隋炀帝所召征,其中吉藏为隋炀帝所重。但炀帝现存文中未见这些僧侣之迹,故略存其名于此。

(二) 隋炀帝文中体现的佛理佛情

隋炀帝现存与佛教有关之文不仅论及佛家事宜,也经常引用佛学典籍,讨论佛家教义,表达自己对佛门的理解,等等。佛家义理艰深,在此仅就隋炀帝文所涉略论一二而已。同时,炀帝对佛门情重,在其文中大量体现,值得注意。

1. 三教并重,佛道同修

隋炀帝对儒、释、道三家,采取的是并用共生的策略,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选择和侧重。从宗教角度看,隋炀帝对佛、道都比较重视。如前所论,他建慧日、法云、金洞四大道场,佛、道各二,同时并立,专供各自弘法传道。隋炀帝亦周旋释、道,流连玄、佛。其《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即是明证。这在其文中亦有明确体现。其《受菩萨戒文》曰:“弟子基承积善,生长皇家,庭

训早趋,胎教夙渐,福理攸钟,妙机须悟。……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祭告智顓文》曰:“颜回不值宣尼,岂邻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长龄?”等,显然都体现其三教并重的思想。又,《宝台经藏愿文》亦曰:“譬前后教门,别赴机性,根茎枝叶,受润终齐,总会津梁,无不入道。犹如问孝问仁,孔酬难别,治身治国,老意无乖。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内外相融,义同混合。”所谓“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内外相融,义同混合”的内在思想,正是其三教观的理论前提。这也符合南北朝以来三教合流的趋势。但不能不说,隋炀帝涉及佛家的诗文远远多过道家,也显示出他作为佛弟子,更倾向于佛家的事实。

2. 聿遵明导,义承大乘

隋炀帝《受菩萨戒疏》曰:“经有明文,敢为臆说?深信佛语,聿遵明导。”这是隋炀帝向佛门、向智顓表明自己的情志态度,即信奉佛经佛语,遵从佛师佛导。但佛教自来有大乘小乘之分,其义理方法功夫等都有区别。而智顓及其天台宗属于大乘,对隋炀帝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曰:“Mahāyāna,梵语摩诃衍,译言大乘。大者对小之称,乘以运载为义,以名教法,即大教也。使求灰身灭智空寂之涅槃之教,谓之小乘。此中有声闻缘觉之别,使开一切智之教,为大乘。”^{[2]401}中一般认为,小乘以灰身灭智为涅槃,以修身自利为宗旨;而大乘佛教以修行成佛为圆满,普济众生为功德。大乘教承认早期结集形成的经典如《阿含经》,但更重视后出经典如《阿弥陀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等。

天台宗尊龙树为初祖,他开创中观学说,其核心思想为《中论》第一品第一颂中所谓“八不偈”,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八不偈”,又称“八无缘起”或“八不中道”,乃基于缘起法的本质立论。缘起法的本质是空,空即无碍,故为中道。龙树重视《法华经》,故该经由鸠摩罗什翻译后,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二祖慧文、三祖慧思、四祖智顓等不断深入研习参悟,代相传承,逐渐形成了“圆融实相”、“止观并修”、“一心三观”等思想。尤其智顓所谓“天台三大部”——《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的出现,标志着天台宗理论体系的基本建立,打破了

南北朝以来北方重禅法,南方重义理的偏向。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南北朝佛统区别时曰:“于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3]332}而智顓及其天台宗正是融合南北的典型。

隋炀帝师承智顓,义归大乘。如其《受菩萨戒疏》曰:“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所谓“小径”,实指小乘,隋炀帝不愿接受。其《王重请义书》又曰:“……若习毗昙,则滞有情著。若修三论,又入空过甚。成实虽复兼举,犹带小乘。释论地持,但通一经之旨。如使次第遍修,僧家尚难尽备,况居俗而欲无崖。当今数论法师,无过此地。但恨不因禅,发多起净心。达者无违,求那明偈。仰惟厚习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学,俄逢圣境。南岳禅师,亲所记莛,说法第一,无以仰过。照禅师来,具述此事。于时心喜,已域寸诚。”隋炀帝在这里再次表明了其反对小乘,接受大乘的态度。而其《祭告智顓文》曰:“所谓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师及弟子,智断具足。”这种“自利利他,人我兼利”的思想正是大乘教义的内容。在《祭告智顓文》中隋炀帝又曰:“当使无边法身,尽承甘露,无量化影,咸进醍醐。涅槃餐之不可穷,般若味之而不竭。尽我念力,遵我师道,销我烦恼,满我誓愿。现在未来,长惠拔提。家国眷属,俱入大乘。密往潜来,恒垂影响,尘劳障累,消除隐塞。究竟等虚空,圆满如法界。”显然大乘教义贯穿终始。

同时,小乘一般认为除了释迦牟尼、弥勒外无佛,文殊、普贤、观音等菩萨都是虚构的,而大乘接受十方世界有无量诸佛,文殊、普贤、观音等菩萨都是真实的。隋炀帝文中涉及的诸佛、菩萨很多。如其《受菩萨戒疏》曰:“奉请十方三世诸佛,本师释迦如来,当降此土。补处弥勒,一切尊经,无量法宝,初心以上,金刚以降,诸尊大权,摩诃萨埵,辟支缘觉,独脱明悟。二十七贤圣,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顶,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释天王,四天大王,天仙龙神,飞腾隐显,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卫法,防身护命护净戒。无量善神,咸愿一念之顷,承佛神力,俱会道场,证明弟子誓愿,摄受弟子功德。”即是明证。

3. 尊重佛规,敬畏佛门

隋炀帝无论是接受菩萨戒,还是敬拜恩师,无论是与僧侣书信往来,还是派专使为智顛设千僧斋会,都是完全按照佛门规矩而行,体现了一个佛弟子的虔诚与认真。其《受菩萨戒疏》曰:“但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要求与心态。当然,隋炀帝确实曾与佛徒争论过佛是否拜俗的问题。《敕禁僧风抗礼》曰:“军国有容,华夷不革。尊主崇上,远存名体。资生运通,理数有仪。三大悬于老宗,两敬立于释府。条格久颁,如何抗礼?”但由于佛徒的反对,释彦琮还作《福田论》相抗,最后作罢。这是僧、俗之争,而隋炀帝对佛徒的妥协可视为其敬畏佛门的一种态度,也是其较为理性的一种表现。

4. 甘为佛子,情系佛师

隋炀帝作佛弟子,与其家庭佛教氛围关,与其自身信仰有关,与其作为政治人物需要获得佛教支持有关,同时与智顛大师也有关系。但隋炀帝敬重佛门,甘为佛子,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其文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炀帝至始至终对智顛尊崇有加,既是对尊师智顛德行及其佛学成就的认可,也体现了杨广的佛家情怀和人生信念。杨广对智顛评价极高。如《受菩萨戒疏》曰:“天台智顛禅师,佛法龙象,童真出家,戒珠因净。年将耳顺,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辨?先物后己,谦挹盛风,名称普闻,众所知识。”《与达奚长儒书》云:“智者禅师德尊望重,近年纡道,爰授净戒。”《答释智顛遗旨文》曰:“佛灭度后,得圣巨多,道耀他方,冥来晓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师,良由宿缘,积曾亲近,爱覃来命,必垂影响。”等等。又,杨广始终执弟子礼甚恭,其书信常随节候问,甚为殷勤,如“金风御节,玉露调时,道体体和,安乐行不?”“热犹炽,愿道体体和。”“岁聿云暮,寒气殊重,禅悦经行,愿常安乐。”“暄和道体胜念。”“春暄,愿道体康胜。”“仲秋转冷,仰惟道体康念。”“寒气渐严,仰惟康豫,动寂怡神,兴居安悦。”等语,每书必见。

隋炀帝文中反复强调二人的师徒关系,还希望永为弟子,其情堪诚。《祭告智顛文》曰:“粤窃闻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资圣范,能遂贤功。颜回不值宣尼,岂邻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长龄?

况乎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导,岂至宝所?复因信受,俱次法城。所谓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师及弟子,智断具足”《遣使人天台为智顛建功德愿文》曰:“智者证知,净土记莳,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脱,不弃缘感,弘到菩提。”《答释智顛遗旨文》曰:“唯愿即日在宝池遥开莲华,令居净域,近溉浊心。世世生生,师资不阙,革凡登圣,给侍无亏。”这显然是智顛大师的修为德行深深影响了隋炀帝的结果。

同时,炀帝还希望自己及家国眷属长入佛门,生生世世,永为佛子,令人感慨。如《受菩萨戒疏》曰:“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弟子即日种罗睺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如日月灯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胜十六沙弥。眷属因缘,法成等侣,俱出有流,到无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众生无尽,度脱不穷。结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赴难,博远如法界,究竟若虚空,具足成就,皆满愿海。”《祭告智顛文》曰:“尽我念力,遵我师道,销我烦恼,满我誓愿。现在未来,长惠拔提。家国眷属,俱入大乘。密往潜来,恒垂影响,尘劳障累,销除隐塞。究竟等虚空,圆满如法界。”即是明证。

综上,隋炀帝现存诗文有很多因为佛家典籍的载录得以留存,故与佛教有关的比例较高。但即使在隋炀帝集未散佚时,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些与佛教有关的诗文看,隋炀帝深受佛教影响,是一个虔诚的而理性的佛弟子。炀帝三教并重,但其宗教情怀倾向于佛家。他受菩萨戒,延请高僧大德,资助扩建寺院,帮助搜集整理佛经,参与各种佛事活动。他尊重佛规,情系佛门。他师承智顛,接受大乘佛教教义,并与智顛保持了良好的师徒、僧俗关系。同时,南北朝以来玄佛合流下的审美倾向应该影响到了隋炀帝,并在其诗文中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

-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2]丁福保.佛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书店,1991.
-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郑迎文]